

钱志富文集诗论卷一

钱志富 著

七月派诗人论

牛草题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七月派诗人论

钱志富 著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七月派诗人论

作者	钱志富
出版发行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印刷者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上水新成路123号三楼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7.85
字数	465千字
版本	2005年9月第一版 2005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
国际书号	ISBN 962-450-811-9/D·47524
定价	港币46.8元 人民币46.8元

写在前面

——《七月派诗人论》自序

2002年5月，我通过了我的博士论文《诗心与现实的强力结合——七月诗派研究》答辩。对于我的博士论文，一些前辈学者如孙玉石、孙绍振等给予了热情的鼓励，一些评委如王泉根、吴思敬、朱德发、黄曼君等还将它评为了优秀毕业论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年轻的杰出的学者即写过一本《七月派作家评传》的当时跟王富仁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的李怡先生非常仔细地阅读了我送给他的论文打印稿，也给了我十分热情的颂扬。重庆出版社的穆仁先生看了我的论文也是称赞有嘉，让我倍感欣慰。照理说，成功地完成了毕业论文的写作而且顺利地通过了答辩，而且获得了不少的好评，我应该高兴才是，可是我这之后的三年时间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我肩上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因为我必须继续写作，——我必须对每一位七月诗派的诗人一生的创作进行切实地研究，并对他们的艺术成就进行准确而切实的评价。这可不是轻松的活计，我得全面、准确地收集到每一位七月派诗人的全部资料，然后进行全面清理，光阅读这些资料就要花费非常多的时间，有时完成一位诗人的研究到最后写成文章常常要费去我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而且我在一所大学里教外语，每周要上近20节课，还要带研究生，当班主任，以及进行别的课题研究，所以我只好利用自己身体有病痛，晚上睡眠不是太好正好读书做学问的优势来阅读资料，写作论文。就这样每完成一个诗人的研究就好像打了一次大仗，而每打完一次仗就会筋疲力尽。好在我写的文章得到了肯定，受到了鼓励。记得今年春节的时候，徐放、贺敬之和鲁煤分别给我打来电话，说看了我写的文章很满意，既有新意，又说到了点子上，

还问我多少岁，当我告诉他们我已经三十八岁时，他们说：“你正当年啊！”鲁煤还专门写了一封信来，称赞我继承了当年鲁迅和胡风的道统和学风。杭州的冀汭在看了我给他写的文章后也来信称赞我采用了“焦点访谈”的让事实说话的方法，对我的研究成果，表示了肯定。成都的杜谷也写了一封长信，不仅肯定我的论文，而且还在信中讨论了他自己的作品，还说要将在我的文章和他的信交重庆的一家刊物发表。写化铁的文章是化铁自己托人在《云南昆明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上发表的。写孙铤的文章是在宁波本地的一家叫《文学港》的刊物上发表的。写田间的文章已经由《新国风》联刊之一的《新华诗》刊出。写鲁煤的文章由鲁煤自己收进了他最近要出版的一本诗集里。写贺敬之的文章已经收入《贺敬之评论文集》，即将出版。写徐放的文章已经得到通知，国内权威的诗歌刊物《诗刊》准备在 2005 年第 11 期上发表。

值得一说的是，我写这本书是在没有得到任何机构的资助的情况下完成的，要知道目前在大学里已经没有人愿意做这样的傻事了，而且出版我也得自己掏腰包，到时能否卖掉，能否收回成本，这也是我这个愚笨的书生所无法预想的事了。好在我毕竟完成了一件事，完成了一件自己愿意花大的力气来做的事，而且这件事基本上得到了一些诚恳的前辈和朋友的认可。当我快写完《牛汉的诗》这一章时，我当时的感觉是：“死可瞑目矣！”

还需要交代一下的是，我研究七月派诗人的方法与一般的学者有些不同。我是把研究和评论还有品评放在一起的，所以论文的前半部分往往有许多的引证，这跟一般的评论文章自然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也可以写成能够为一般读者所认可的纯粹的评论文章，如果那样我的书就好写多了，也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可是我没有这样做，我认为这样做是一种偷懒，而偷懒不是学问。同时我的文章也不是一般的研究文章，不是资料汇编，因为它寄寓了我对它们的评价和鉴赏。我的这

本书基本上照顾到了学术研究和诗歌批评，固然这里面也有资料的保存。一些前辈读了我写的文章可能不习惯，建议我改变一下写作方式，可是我没改，因为这种方式是我比较熟悉的方式，改了就不是我了。再加上，我写完了文章已经筋疲力尽了，动作一下是比较觉得疲苦的，所以我恳请前辈们原谅我的固执和疏懒。

本来我是要把我的博士论文与这本书合起来出版的，我的恩师吕进先生的序和何满子前辈题写的书名都弄好了，但我觉得应该先把单论各位七月派诗人的文章合在一起单独印一本书，如果这本书能够收回成本或略有结余，我再印一本更大的书，这样我就有两本关于七月诗派研究的书了。

我这种想法可能是愚蠢的，但我还是决意这样做，这足见我的固执，但以前曾经听人家说过，凡了不起的事情都是傻子做的，比如修长城，比如挖运河等等。聪明人只配做一些支配人的事。想到这些，我突然有了这样决定的勇气。

最后，我要感谢牛汉先生流着汗给我题写了书名，要知道他替我写这本书的书名是费了很大的力气的和许多的纸墨的。诚恳地说，牛汉先生的字写得比较笨拙，看来我是找对人了。我们笨到一起去了。

第一章 绪论 胡风对七月诗派形成的作用

胡风是七月诗派乃至整个七月文学流派形成的灵魂性的人物。关于此，七月派著名诗人绿原有过论述，他说：“‘七月派’也罢，‘胡风集团’也罢，流派也罢，‘宗派’也罢，一群普通的文化人是围绕胡风一人结合起来的；他们之间并没有天然的共同性，有些人彼此甚至并不认识，因此他们的结合只能证明胡风本人是一个精神上的多面体；以这个多面体为主焦点，这个流派的基本成员各自发出缤纷的光彩，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形成一个罕见的，可一不可再的，真正体现集合概念的群体；虽然如此，离开了胡风及其主观战斗精神，这个群体将不复存在，只能保留它的历史形态供后人研究，而其成员今后的个别成就都不足以产生流派的影响。”^[1]又说：“胡风不仅作为诗人和评论家，而且作为出色的文艺组织家，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关于他这方面的实践经验，由于客观认识还达不到，研究工作几乎没有开始。”^[2]本文作者深受绿原这段话的启发拟从下面几个方面简单谈一谈胡风对七月诗派形成的作用：①胡风关于文学流派的认识或理想和理念；②胡风文学思想对于七月诗派形成的作用；③胡风作为诗人和诗评家对七月诗派形成的作用；④胡风作为文艺组织家即编辑家对七月诗派形成的作用；⑤胡风的人格魅力对七月诗派形成的作用。

一 胡风关于文学流派的认识

“一个流派开始时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创造一个什么流派，往往是很多人朝着某些共同点走，而且是非常顽固地这样走，是自自然然地形

成的。”^[3]艾青如是说。是的，七月派在开始时也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创造的，胡风虽然把文学当作一种神圣的事业来看和来做，然而在一开始，他并没有有意识地要亲手缔造一个什么流派。关于此，诗人牛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亲自问过他，胡风是否承认了的。牛汉在《关于“七月派”的几个问题》中写到：“‘七月诗派’的形成，胡风起了重要作用，这是肯定的，但也不能说是胡风一个人的作用。胡风对于诗，对于艺术有他个人的见解，有真知灼见。办刊物有组织才能，选稿有自己独到的眼光，通过刊物吸引了众多的青年人，这都是事实。但是，所谓‘七月派’的作者们当时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流派已经形成，或者为了这流派的形成，他们有目的地在《七月》或《希望》上写诗。——我今年就这个问题问过胡风，他表示，当时并没有这样想过。”^[4]是的，胡风作为一个中国新文学史上重要的文艺理论家不会不懂文学流派需自自然然地形成的道理，他也不是一个文学道路上的野心家，明目张胆地宣告他要有意识地制造一个所谓的文学流派。然而胡风并不是没有流派意识，只不过是它不愿意轻易说出而已。胡风不但有流派意识而且还十分重视流派竞争对于推动文学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更为可贵的是胡风认识到了文学流派形成与时代关系的重要性，他知道文学的发展也必须与时俱进，文学流派不能超越他所由产生的那个特定的时代。早在三十年代前期，胡风在日本与郭沫若会见时就谈到过这一问题。胡风在《胡风自传》中这样写到：“送他回去坐在月台上等车的时候，他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留学生中不能出现象创造社那样的文学团体？我的回答是，现在和他青年时不同，现在的阶级性被普通承认了，单纯地以文学志愿为宗旨的文学团体，恐怕是不容易出现的，他也表示了同意。”^[5]胡风正是认识到了新的时代特性对文学社团（或流派）具有新的规定性，所以他在1936年发表的《文学修业的一个基本形态》一文中才提出了新的文学流派理念。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他说：“我的意思是，在现在，形

成一个同人团体性格的不一定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主张或创作态度。”

^[6]这显然同他与郭沫若的东京谈话如出一辙，只不过经过数年的酝酿、思考，成熟了，操作性更强了。“一个同人团体的生命应该寄附在它所由来的生活环境，它能够接触而且应该接触的社会关系里面。”

^[7]“我所说的同人团体指的是由文学爱好者志愿者组织起来的。或者是某个学校里的同学，或者是某个地域里的熟人，或者是某个职业领域里的同事……它们发生自特定的生活环境，能够而且应该从那里取得营养，在那里发生作用。”^[8]七月文学流派后来的发展证明胡风提出的这种文学流派作业方式是可行的，七月派之所以能把不同地域，不同职业领域或特定生活环境中的同道伙友聚结起来，跟他这种明确的流派理念不无关系。拿七月诗派来讲，当时就有几人群落：田间、天蓝，鲁藜、侯唯动、孙钿在解放区；而绿原、曾卓、阿垅、杜谷、冀沅等在国统区，又集中在复旦大学等学校里，是熟人，是朋友，是同事，并分别在各自的领域里吸取人生和艺术上的营养。胡风还在这篇文章里进一步说了四点具体作法：“第一，应该广泛的吸收周围的爱好文学的分子，一方面扩大团体的基础，一方面也就是扩大接触人生观感人生的机会”。“第二，团体分子的活动应该深入到周围的生活环境里面。”“第三，在团体人员中间把创作彼此传观、朗诵，互相批判，养成批判的精神和健康的自信。”“第四，一本好书，一个文学上的问题，应该互相介绍，互相讨论，把好的文学影响扩大开去。”

^[9]前两条无疑是把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操作方法贯彻了下来，后两条是互相批评，互相提高，流派成员间的关系有了纽带，是流派的组织形式。单纯地从流派的形成来看，七月派似乎真的是有领导有组织有纲领的，这个流派的领袖无疑是胡风，组织是七月社和刊物以及出版社等，而纲领就是这篇《文学修业的一个基本形态》。当然，七月派只是一个文学流派，并不是一个政治实体，既不是一个反党组织，更不是反革命组织，自然七月派也有自己的政治倾向，那就是为人民的

幸福和利益而用文学作为武器而战斗的政治信仰。

胡风以他的刊物、文艺理论以及人格力量团结了一批诗人和作家，七月派在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已经成为了一个活跃的而有杰出贡献的文学实体了，已经有人呼之曰“胡风派”了，虽然由于宗派思想的影响，“胡风派”含有贬斥的意味。胡风虽然不轻言流派，然而就客观实际来讲，他是承认的。1947 年左右，文学青年耿庸拜访他，他说：“文学本来就免不了有各样的派别，中国新文学的童年时期就有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两个派别，或者说是现实主义派和浪漫主义派。”^[10]胡风不轻言流派，但也不讳言流派，从此可见一斑。胡风对文学流派的界定是取的“同人团体”，从事文学活动的结果其文学创作也以同人杂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胡风肯定了同人团体的重要作用，并认为这是五四新文学传统之一：“回顾一下，在新文学的发展史上，同人团体的战绩是很大的，抽调了它，新的文学史就差不多等于一张白纸。同人团体造成了养育作家刺激作家的环境，由于他们的活动，由于他们的工作的相克或相成，才形成了一个进步的新文学传统，五四的革命文学传统。”^[11]胡风正是在文学事业上继承了这一传统，因此才组织形成了七月社这样的同人团体，才创办了《七月》、《希望》这样的同人刊物，也是依靠同人的力量才形成了七月这样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七月诗派是七月文学流派最重要的一支，关于此，胡风晚年是承认其存在的：“《七月》以前，我编过《海燕》两期，《工作与学习丛刊》四本，在诗上作为派，是从那时开始的，艾青是在《丛刊》上开始发表作品的。解放前，出版了一些不合法的青年小刊物，都是直接同我和七月诗人有关的。例如《泥土》（北平），《呼吸》（成都），《蚂蚁小辑》（南京）等。解放后徐放编的《现实诗丛》也都是属于七月派的。”^[12]

应该提及的是，胡风对流派运作中宗派主义倾向十分警惕，他办社团，弄刊物是尽量以文学艺术的本身来说话的，胡风是把宗派主义同

封建主义加以等同并排斥的。他举例说中国新文学的童年时期本来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文学流派，而且这些文学流派中还派中有派，十分丰富和复杂。“但是长时期封建思想的渗透甚至达到反封建的人们的头脑，文学流派如果没有对封建思想的充分自觉的警惕和排斥，就不免沦为宗派。宗派性，宗派，宗派主义，本质上都是封建主义。”^[13]又说，“具体情况可就复杂了，甲派中的张三李四在某个问题上会同情、支持或是利用乙派中的赵大钱二反对他们由于某种原因正要反对的丙派的周五吴六，等到出现另一个原因，就跟着变化出另一副脸孔。封建主义也实行实用主义的。”^[14]胡风也把宗派主义者同市侩、政客联系起来，一语中的，看破了宗派主义的本质。他说：“是的，是市侩，也是政客。已经不是作什么文学艺术工作了，然而仍然舒舒服服当他们的文学家，在他们的派里成了出色的人物，在文坛上又好像他们是无派别性的主持公道的君子。”^[15]更为可怕的是，宗派主义者还往往把真正的文学流派当作宗派主义来打击，恶毒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动用政治或政权的力量，他们热衷对权力的追求，争取话语霸权和当权者的支持，以便置反对者一方于死地。胡风在三十年代初期左联时代就受到构陷，好在有鲁迅在，救了他一把，不然，他会同巴金、黄源几个人被无辜陷害了。关于此，鲁迅曾尖锐指出宗派主义“以政治杀人”的恶劣事实。“在理论上，如《文学界》创刊号上所发表的关于‘联合问题’和‘国防文学’的文章，是基本上宗派主义的。”^[16]鲁迅发现当时一些自我标榜为“指导家”的人们正在借“政治”来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愤激地说：“我那时实在有点怀疑那些自称‘指导家’以及徐懋庸式的青年，因为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是借革命以营私，老实说，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17]七月派

以后历次运动中的悲惨遭遇都证明，七月派不是一个宗派。七月派并不是不讲政治，然而他们对于政治的理解，只是对于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政党的向往、支持和帮助，而对于欺压、蒙骗、剥削人民的暴力集团的憎恨、攻击，七月派在政治倾向上无疑是站在共产党一边的，也就是站在人民一边的。他们并没有想到从新的政权力量那里去谋求个人的霸权，以便压制反对者。他们一面以坚实而雄厚的文学实力贡献给文坛，出了一批大诗人，大作家，一面又要同各种各样的宗派主义战斗，自然这样的流派也是排他的，因为，如艾青所说：“产生流派总是由于共同赞成这样的主张或那样的主张而结合的结果，……由于流派总是按照自己鲜明的主张而行事的，所以他总是表现为排斥其它。”^[18]正是因为流派有排他性，所以流派之间才有论争、批评，有时甚至是反批评。这本来是十分正常的流派行为，然而一些人把文学流派的排他性当作宗派性来看，认为七月派也是一个宗派，这样就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将七月文学流派一群置于了一个政治处境上非常不利的地位，在五十年代甚至动用国家机器使之从“小集团”、“宗派”上升到“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加以镇压，酿成悲剧。尽管如此，胡风对于宗派性的警惕和排斥给我们的文学史提供了一笔宝贵的遗产，同时也给流派理论提供一笔宝贵的理论资源。文学流派之间应该展开竞赛，而不是政治上平等的赛事，不能受到宗派主义的干扰。

二 胡风文艺思想对于七月诗派形成的作用

胡风是中国新文学史上重要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家，聚结在他周围的作家、诗人恐怕或多或少都受过他的文艺思想的影响。七月诗派正是在他的文艺思想影响下而凝聚在一起的。在此我们举上两三个例子。一是延安的侯唯动。侯唯动曾说：“没有胡风便没有我侯唯动！”

^[19]他是典型的从读者中走向胡风的例子。他曾这样说起胡风文艺思想对他的影响：“袁轲、郭铁和我三弟唯直，都崇拜鲁迅，读过萧军《八月的乡村》，更把胡风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那篇文章，当成我们创作实践的纲领。”^[20]又说：“为啥读蒲风的‘国防诗歌’，总觉得没后劲？胡风的这篇文章像一把打锣锤，一下子敲在我们的心上，自然会铮铮震响了。一来叫民族革命，二来叫大众文学。我们可实实在在完完全全是大众呀。”^[21]胡风的文艺思想不仅影响了延安解放区侯唯动等的创作实践，并且发表了诸如田间、天蓝、鲁藜等的大量诗歌作品，大量有影响的诗歌作品。侯唯动说：“胡风培植了我，在祖国的沃土上，我从此不断地绽红花结香果。”^[22]侯唯动的《斗争就有胜利》是抗战时最为轰动的作品之一，而正是《七月》把它发表了出来。

另一例是曾卓。曾卓没有在胡风主编的《七月》、《希望》上发表过作品，也没有诗集进入《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然而他是重要的七月诗派诗人。然而曾卓还是承认：“我年轻时在文艺思想上，特别是在对于诗的观点上，是深受他（指胡风——钱按）的。”^[23]曾卓这样写到：“我最初是由于对鲁迅先生的热爱而注意到他的。我将他看成是鲁迅的战友和学生，当时有这样看法的人是不不少的。他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的《林语堂论》和发表在《文学季刊》上的《张天翼论》（记得署名是胡丰），他和周扬关于典型问题的论争，我都认真阅读过。那一场由他的一篇文章（那是鲁迅和雪峰授意他写的）而引起的关于两个口号的大论战，是当时我和几个少年朋友们经常的话题。我们未必很了解问题的实质，但本能地是站在鲁迅这一边的。后来，他编的刊物（从《海燕》、《工作与学习丛刊》到《七月》、《希望》），丛书，我大都看过。我认为他是一位严肃认真而且是很高审美水平的编者。他陆续出版了几本论文集，我都反复读过。可以说，在我的青少年时期，在对文艺的基本理解上，我受他的影响最大，并培养了

我对理论的兴趣。由于我写一点诗，我非常注意他的关于诗的理论。他强调‘战士和诗人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认为真正的诗人必须为人类的自由和幸福而斗争；强调诗人必须深入生活，必须与人民共呼吸；强调诗人必须将思想化为自己的血肉，表现为对待生活的激情，强调诗人与诗的一致，诗的表现力与人的战斗力不可分开；同时强调诗必须是诗，对诗的艺术进行多方面的探讨……这些都给了我以教益。我现在对诗的一点理解，就是在那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传说的他对我的一首散文诗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批评，也曾使我暗自反省，我后来在写诗的道路（也就是在做人的道路）上就有所警惕。而且，我感到可贵的还在于，他的理论文章洋溢着激情，不仅是以道理来说服读者，也是以他燃烧着的心来感染、鼓舞和激励读者的。”^[24]由此看出，曾卓追随的还是七月派的足迹，而他自己也乐于同七月派站在一起。他说：“我看到新文学史研究者，将我也看作是‘七月派’的一个成员。我并没有在胡风编的刊物上发表过东西。但从诗的战斗方向上说，从诗的总的风格上说，是可以这样看的吧。至于就我个人说，我是深受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的，‘七月派’诗人又大都是我尊敬的友人，我乐于和他们站在一起。”^[25]

绿原也述说了胡风文艺思想对他的影响：“我总觉得，和胡风在一起，我莫名其妙地爱好起来的诗，在人生中并不具有第一位的意义，应该还有比它更高更重要的义务在，那就是做人；有时却又觉得诗是神圣的，神圣得甚至超过了第一位，连口头谈一下都会亵渎了它似的。因为，‘世上最强之物莫过于人生，’只有人生至上主义者才能成为艺术至上主义者，而‘丢掉了人生就等于丢掉了艺术自己’。这可能就是我最初所接受的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26]绿原还说及了胡风对他创作实践的具体指导：“在写作方面，我当时脱去了《童话》时期的天真和明朗，一度热中于一些雕琢而又朦胧的意象；胡风也是几次来信，叮嘱我注意保持情绪的自然状态，不要把它揉了又揉揉到扭曲的

程度，同时叫我警惕追求所谓‘绮语’的倾向。但是，他从没有具体地教过我怎样写一首诗。我体会到，他始终在希望我，督促我，激励我经过自己的探索 and 发现把诗写出来。正是这样，我陆续写出了一些仿佛在从心里流出来的政治抒情诗，大都由他编在《希望》上发表了。我没有赶上《七月》，却赶上了《希望》，高兴得像胡风在‘编后记’里说到过的一只翻过巍峨的土丘仰望蓝天的小蚂蚁。”^[27]侯唯动说没有胡风就没有他侯唯动，同理，没有胡风也没有后期七月诗派重要诗人绿原。

以上是我们举的几个实际例子，说明胡风文艺思想对七月诗派成员的创作实践确有影响。有的论者也许会说，七月诗派中资历更深、成就更大的成员也许没有受过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吧，比如艾青，比如田间等。应该说艾青、田间的确受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要少些，然而不能说没有。马希良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到胡风对这两位诗人的评论对他们“愈益完美的成熟境界”起到过“催导作用”，这是令人信服的。他说：“这一学期，我读了胡风编辑于1937年的《工作与学习丛刊》其中载有鲁迅的《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我更加理解到胡风对鲁迅先生的敬爱；同时我还读到了胡风本人的论文集《密云期风习小纪》对于艾青和田间两位诗人的评价，饱含着他对一代新人的敏锐洞察力和对诗歌卓越的鉴赏才能，对他们的作品达到愈益完美的成熟境界，是起到催导作用的。其实，我也敬爱这两位诗，如果说田间的诗是火的燃烧，颗颗火星都爆炸出对敌人的极大愤怒和仇恨；那么，艾青的诗就是画的舒展，字字倾泻着热爱祖国大地的深情实感；对我学习写诗都有很大的影响。”^[28]艾青、田间与胡风是七月诗派形成过程中三个灵魂性的人物，他们共享着相同的文艺思想，胡风之所以大量发表他们的诗歌作品，并替他们编出诗集出版，也正是胡风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体现。胡风的文艺思想体现在他对文艺作品的评论以及编选之中，并不是说非要见诸文字才体现出他卓越的文艺思想。朱健、牛

汉似乎没怎么受过胡风文艺思想文献部分的影响，然而他们正是受到了《七月》、《希望》上所发文艺作品的影响，才走上了文艺道路的。朱健这样描述刚试验写诗时的情状：“1941年，皖南事变灾难风暴余威把我从秀美僻静的川北小城，抛到了黄土苍穹、劲风大谷的西北高原。我成了一名年轻的政治逃亡者。浑浑噩噩的心灵中积聚着热烈悲壮的追求，苍凉激越的幻梦，迷惘失落的寂寞。此种情感犹如西北高原雄浑苍茫的风景在心灵中的投影；或者说，西北高原雄浑苍茫的风景犹如此种情感的外部存在。而每一个政治逃亡者于茫茫人海中总是有着无数难言之隐，难言之苦，难言之痛的。就是在这种情景下，艾青、田间、天蓝那些浸染着祖国和人民血泪苦难的诗句在我的记忆中复活了，成为我可以倾吐情愫，接通呼吸的活的对象。于是，摹仿他们的声音，我在一些零碎纸片上记下自己的难言之隐，难言之苦，难言之痛。一吐为快而已，哪里想到过这可以称之为诗。”^[29]初学写作，自然是幼稚的，然而这正是他庄严的诗歌写作的开始，朱健从七月诗派诸诗人的作品中受到了启蒙和洗礼，因而才开始庄严地对待人生，庄严地对待诗的，这不能不包含胡风文艺思想对他的影响。他说：“远在重庆的少年挚友诗人白沙，不断地寄来鼓励，寄来他所能收集到的诗刊、诗集。比如桂林出版的刊物《诗创作》和《七月诗丛》。于是，我便读到了胡风的《论诗短札》，读到了 SM、绿原、鲁藜、冀沱的诗集。紫柏山麓，青羊河畔，深夜闭户，摇曳的烛光下，披读这些芳香四溢的诗文，我的心沉静、清亮而热烈，似乎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领受着诗的启蒙和洗礼。初识诗之有无，我领会到的诗学开宗明义之篇是：庄严地对待人生，庄严地对待诗。”^[30]朱健正是这样学会了庄严地对待人生，庄严地对待诗才写出了名篇《骆驼和星》，现在读来还痛快淋漓。

牛汉曾明确说过，他不是看了胡风的理论才写诗的，他说：“回忆起来，我就不是看了胡风的理论，看了七月派‘纲领’（即使有的话）

才写诗的。胡风作为文学理论家，他本人就首先反对这种创作方法。”^[31]

“事实上，当时的一大批文学青年看了艾青、田间的作品，看了胡风编的《七月》、《希望》，在那样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受到感染，引起共鸣。那个影响是非常深刻，非常强烈的，不但影响了他们的创作，而且影响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人生道路。”^[32]牛汉还说：“更重要的是，他（指胡风——钱按）通过办刊物、选稿贯彻自己的美学观点、理论主张，通过刊物上的作品影响了读者。”^[33]牛汉对于《七月》、《希望》上的大块理论文章“或者看不大懂”，“或者没有兴趣”，往往“看看就放下了”，但这不能说明牛汉当年没有接受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事实证明牛汉是七月派的同道伙友，是一位在创作上较有成就的七月派诗人，他也写出过许许多多一步一滴血的现实主义的诗歌作品，不然胡风不会接受他的《采色的生活》，把他放在《七月诗丛》第二辑里出版。

胡风本人比较注重文艺理论对创作实践的作用。关于此，诗人化铁有一段话说：“这些作品（指他在路翎处读到的田间、天蓝、孙铤、鲁藜等从延安寄来的投向《七月》的诗稿——钱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对旧世界的鞭鞑，对新世界的追求与向往。如果说，这些作品的出现，是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那么，胡风的文艺评论正是这个产物的催生婆。他始终认为文艺评论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是要对人类行为之一的文艺现象取得正确的认识，作出是或非，真或假，美或丑，有益或有害的具体分析和如实的判断；二是特别培养与引导青年作者和读者‘从生活的真实提升，创造出艺术的真实……’。他认为：‘他们（指青年作者、读者）中凡在创作上取得成绩的，一定是对人民对生活采取了真诚的态度。这个态度的真实性或真诚度如何，就决定了他们的创作成绩如何。’他的这种对待文艺创作的认识论，是他对作品选择取舍的尺度，是他